



深度

评论

杨路：中国还是不是发展中国家？

标签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用这个标签做什么。

2019-08-23



美国在世界贸易组织(WTO)推动的一系列规则改变，其中最大的要求，莫过于取消中国现有的“发展中国家”地位，这个要求遭到了中国的激烈反对。摄：STR/AFP/Getty Images

与中美贸易战平行推进的，是美国在世界贸易组织（WTO）推动的一系列规则改变。美国最大的要求，莫过于取消中国现有的“发展中国家”地位，这个要求遭到了中国的激烈反对。但是如果深入观察，很快就会发现其实在现有WTO规则下，中国并没有因“发展中国家”的标签而获得太多优免。但私下里，一些中国官员的态度却是，中国愿意调整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待遇，但“发展中国家”的头衔必须保留。

那么，中国究竟还算不算“发展中国家”？为什么这个标签对中国如此重要？

美国：中国不是发展中国家

今年7月26日，贸易战正酣之时，美国再次提出了这个问题。而在7月白宫发出备忘录之后，中国官方媒体也立刻组织了一轮宣传反击。

去年2月，蓄势待发的中美贸易战吸引了媒体大部分的精力，并没有太多人注意到美国在日内瓦向WTO成员散发的一份倡议。这份长达45页的文件用了大量篇幅说明，当前WTO对发展中国家“特殊和有区别的待遇”，已经不再符合现实，还成为了WTO未来谈判的阻碍，以及世界贸易进一步自由化的绊脚石，到了需要变革的时候。

美国的这份报告用了大量数据和例子来说明许多在WTO里享受发展中国家待遇的成员（主要是中国，但香港、台湾、韩国、新加坡也多有提及），在各项经济社会指标上（如贸易，国民收入，对外投资，科技，跨国公司，国防力量），其实已经相当发达，不应该再算作“发展中”。

今年7月26日，贸易战正酣之时，美国再次提出了这个问题。白宫向美国贸易代表（USTR，现任代表为莱特希泽）公开发出备忘录，要求 USTR 在90天内采取行动，纠正一些国家因发展中国家地位而获得的“不公平贸易利益”。

中国在上述两次美国提议后，都立即提出了明确反对。在去年美国发出WTO倡议之后，中国立即联合印度、南非等国，发表了一份回应。这份回应开头引用美国国父托马斯杰斐逊名言“平等对待不平等乃是终极不平等”，批评美国“选择性摘取一些经济和贸易数据”，而忽

略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仍然普遍存在的巨大经济鸿沟。中国驻WTO代表张向晨在随后的公开声明中特别指出：“自WTO成立至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人均GDP上的差距反而拉大了”。

而在7月白宫发出备忘录之后，中国官方媒体也立刻组织了一轮宣传反击：发展中国家，是自己“长大”的，而不是“吓大”的。发展中国家当前在WTO中，不是权利太大，而是太小；美国的提议，自然十分“荒唐”。

从“第三世界”到“发展中国家”

“发展程度低的国家” 还有几个类似的说法，但各有各的问题。

“发展中国家”这个词的具体起源已经不可考，但在大众媒体词汇表上，“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的直接继承者。很多人会将两者等同，因为两者通常都意味着“穷国”。尽管今天的主流媒体已经很少再用这个词，但并不妨碍许多老派的人继续使用，如在去年的口水战中，白宫经济顾问库德罗（Larry Kudlow）就公开宣称：“中国已经是一个第一世界经济，却表现得像个第三世界经济”（“China is a first-world economy, behaving like a third-world economy”）。

“第三世界”的说法，来自于“三个世界论”，其本质是用意识形态将国家归类：资本主义国家为“第一世界”，共产主义国家为“第二世界”，而其余那些难以定义意识形态的国家，则为“第三世界”。“第三世界”这个词第一次在大众媒体上出现，是1952年法国人萨维（Alfred Sauvy）在《观察家》(L'Observateur)上，借用法国大革命前“三个等级”的分类，感慨徐徐落下的意识形态铁幕正在地球上形成“三个世界”。

60年代全世界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造就了许多意识形态上难以用“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两分法定义的新国家，而这些国家普遍较为贫穷。因此“第三世界”也就渐渐淡化了意识形态色彩，而强调其经济特征。

“第三世界”后来渐渐过时，主要是因为这个词有一定的等级色彩。今天的许多媒体编辑指引（如美联社），都以“第三世界”带有贬义为理由，建议在出版物中使用“发展中国家”一词替代。

今天的国际社会对于哪些是“最不发达国家”（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LDC）有普遍的共识。联合国从70年代就建立了一个明确可操作的判断标准：贫困、营养水平、教育、健康、识字率、经济脆弱性。根据这些指标，今天全世界共有47个最不发达国家，其中33个在非洲。

除此之外，“发展程度低的国家”还有几个类似的说法，但各有各的问题。“不结盟运动”（non-aligned movement, NAM）的国家成员，说法与“第三世界”类似，但这个标签更为强调意识形态属性，而不是经济特征。“南方国家”的概念（Global South）虽然完全从发展程度出发，与“第三世界”理论上更为接近，但其名称中的地理意涵常常造成混淆（贫穷国家虽然大多在南半球，但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两个公认的富裕国家也在南半球。同时北半球也有很多贫穷国家，如孟加拉国）。



2018年2月，美国在日内瓦向WTO成员散发的一份倡议，用了大量篇幅说明，当前WTO对发展中国家“特殊和有区别的待遇”，已经不再符合现实，还成为了WTO未来谈判的阻碍，以及世界贸易进一步自由化的绊脚石，到了需要变革的时候。摄：Wang Zhao/AFP/Getty Images

谁是发展中国家？

对于市场交易机构来说，如何归类中国会产生“真金白银”的后果。

马来西亚是发展中国家，洪都拉斯也是发展中国家，即使前者是后者人均GDP的5倍。介于“最不发达”和“发达”之间是大片的灰色地带。到底怎样才算是“发展中”，从来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和范围。以发展和减贫为目标的世界银行，以“国民总收入”（Gross National Income, GNI）将所有国家分为四类：低收入（人均GNI低于995美元）；中低收入（996-3895美元）；中高收入（3896-12055美元）；高收入（高于12055美元）。而在2016年之前，世界银行常常非正式地将前两组当做发展中国家的指标。如果严格按照这个标准，中国（2018年人均GNI为9470美元，属于世界银行标准下的中高收入国家）算不上发展中国家。但这从来只是一种非正式的做法，收入只是众多发展指标的一项。2016年之后，世界银行在其数据归类中完全取消了“发展中国家”这个类别。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则将近40个成员列为“发达经济体”（Advanced Economies），其余140多个成员则全部装进“新兴市场及发展中经济体”（Emerging Market and Developing Economies）这个大口袋里。为了避免质疑，IMF特意强调这个分类只是为了“方便起见”（for convenience），而非基于任何标准。中国在IMF的上述分类中，上属于“新兴市场及发展中经济体”。

对于市场交易机构来说，如何归类中国会产生“真金白银”的后果，因为指数工具是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把中国放在什么类型的指数中（中国和什么经济体更类似？），以及相应的权重设计，会直接影响交易和投资策略。比如在外汇交易中，中国按照一般分类属于“大型新兴经济体”（Large Emerging Economy）。新兴市场的一般特点是，如果出现增长压力，通常会出现本币资产贬值，资本外流（如中国在2015年，或者最近的阿根廷）。但在一些情况下（如2018年），面对经济减速，中国却表现得更像是发达经济体（Developed Economy）——资本流入增加，本币资产相对稳定。这样的“非驴非马”，经常导致中国需要单独的指数和交易策略，而不能和其他新兴市场经济放在一个篮子里。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 HDI)，旨在全面衡量各国发展水平，从教育、医疗到性别平等，有一系列量化指标，但也避了“哪些是发展中国家”这个烫手山芋，只是就事论事地根据 HDI 将国家分为发展程度“非常高/高/中等/低”四个组别。中国在 HDI 的189个观察对象中排名第86，属于“高”。

WTO 与上述国际组织都不同，并不避免“发展中国家”这个概念，恰恰相反，其条约和规则中大量使用这个概念，甚至有专章讨论发展中国家待遇。但是，WTO认定发展中国家的办法非常特别：首先，最不发达国家（根据世界银行认定，有明确标准，也会定期调整）自动享受发展中国家待遇。但在这之外，则完全灵活，成员完全可以“自封”为发展中国家，只要其他条约成员接受即可。此外，一个成员可以在某一条约中宣布自己是“发展中国家”，而在其他条约中不动用这个选项（如韩国只在涉及渔业和农业的贸易谈判中宣布自己是“发展中国家”）；或者，以前使用过这个选项，但承诺未来不再使用（如台湾和巴西）；又或者，虽然以前没有宣布过，但未来决定使用这个身份。

“发展中”身份在WTO中完全是一个动态选项。WTO对外宣称164个成员中有“大约三分之二”是发展中经济体，但每个成员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使用了这个身份，千差万别。这也就造成了许多WTO意义上的“发展中经济体”和普通人的认知有不小区别。前文提到的白宫发布的“不公平贸易利益”备忘录，就专门点名了香港、澳门、韩国、新加坡（都在WTO中各类谈判中至少使用过一次“发展中经济体”身份）这些很多人眼中的“发达地区”，以试图证明这一机制的不合理。



中国是同期加入世贸组织的成员中作出改革承诺最多的，同时中国在入世之后的经济增长也是显著的，两者之间存在因果联系。摄：Goh Chai Hin/AFP/Getty Images

发展中国家特别待遇的前世今生

大量的新独立国家虽然在经济地位上仍然“边缘”，却因数量大增而政治话语权加强。

为什么 WTO 会对发展中国家提供优惠条件？

在殖民时代，大量国际贸易发生在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宗主国作为工业化的“核心”国家，以技术和资本为优势，向位于“边缘”的殖民地，输出制成品，并获得原材料和人力。双方之间的贸易条件（如关税高低，市场准入等），以宗主关系为基础。到了1960年代，殖民地纷纷独立，宗主关系不再，贸易条件也随之需要重新议定。大量的新独立国家虽然在经济地位上仍然“边缘”，却因数量大增而政治话语权加强。因此对于发达国家来说，要想维持国际贸易，就必须向这些大量出现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优惠。

当时主流的发展经济学，对于贸易自由化抱有相当的警惕。不少经济学家认为如果全方位开放贸易，发展中国家就会对发达国家产生技术和资本依赖，只能永远出口初级产品，而无法实现工业化，固化为“边缘”国家。在这个逻辑下，发展中国家需要“保护”国内市场，以实现进口替代的观点十分流行。在国际贸易中开放市场、降低关税的行为，也被视为一种牺牲和损失。

上述两个条件叠加，就推动了关贸总协定（GATT, WTO的前身）在1965年加入了著名的第四部分，即“贸易与发展”一章。条约的这一部分规定了，发达成员与发展中成员谈判时，实行非对等（non-reciprocity）原则。这一原则就是今天WTO规则中，发展中国家优惠待遇的基础，往往被概括为“特殊和有区别的待遇”（Special and Differentiated Treatment, SDT）。

根据SDT原则，发达国家需要主动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贸易优惠条件，而发展中国家则不需要提供对等待遇。同时，发展中国家往往可以获得更多的时间来落实新的条约承诺，或者有更长的缓冲期来执行条约承诺。

举例来说，美国（1948年加入关贸总协定）是无争议的发达国家，而尼日利亚（1960年加入关贸总协定）是公认的发展中国家。作为发展中国家，尼日利亚在加入WTO后，仍然可以执行比美国高的多的关税。2013年时，美国人均GDP约53,000美元，为尼日利亚（3,000美元）的近18倍。美国当年的平均应用进口税率为3.4%，而尼日利亚则高达11.7%。关税税率的表面“不对等”，并不影响发展中国家参与WTO。中国2001年加入WTO，加入条件中也包含了多个基于发展中国家身份的“过渡期”，比如7年之内将平均关税降低到10%，5年之内对外资银行开放人民币业务，等等。

除了扩大成员数量这个动机之外，WTO向发展中国家提供“非对等”优惠条件也有许多现实和技术性的考量。发展中国家普遍征税能力不强，关税是许多新兴国家的重要财政来源，短期内大幅降低关税，虽然可以促进贸易，但也有可能削弱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因此需要阶段性降低税率。此外，不少新兴国家也没有足够的专业人才，来处理复杂的国际贸易事务，技术援助和过渡期不可或缺。

但发展中国家的特殊优待也造成了一系列问题。首先就是其不对等性，虽然有一定的道义基础，但在实践中，不对等待遇常常导致发达国家没有太大的动力提供优惠，或者只是选择性地提供优惠。前文提到的关贸总协定第四部分，虽然支持了发展中国家权利，但并没有太强的约束力，只是一个要求发达国家“尽力”（best endeavor）的要求。其结果就是，发达国家在提供优惠时常常有所保留。

以美国和尼日利亚为例，虽然美国的平均关税比尼日利亚低的多，但是在发展中国家出口量集中的农产品、纺织品、服装这几个单项上，美国的关税都明显高于其平均税率，这就实际上限制了发展中国产品进入美国市场，导致实际优惠往往有限。此外在WTO谈判中，虽然国家可以自行主张其发展中国家身份，但必须要得到其他缔约方的一致认可才行，这也就形成了另外一重限制。

美国的抱怨的确也点到了一些实际的问题。

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地位，是不是真的像美国如今大声抱怨的那样，完全“不公平”，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美国的抱怨的确也点到了一些实际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在理论上，都有

可能在某一时刻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但是现有的WTO规则却没有任何“毕业”的要求，这也就消解了发展中国家优惠待遇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台湾和巴西去年主动要求毕业（承诺在未来谈判中不使用发展中国家身份），自然是出于多重考虑、主动向美国立场靠拢。但是在没有外部约束的情况下，主动毕业的情况很难强求。

特别待遇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也不完全是好事。非对等开放贸易的可能性，常常为贸易保护主义提供了一个借口。60年代以来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反复显示，幼稚产业保护和进口替代政策在实践中大部分时候弊大于利，常常助长权利寻租和资源浪费，反而阻碍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因此高壁垒、低承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不再是经济优惠，而是发展障碍。这当然不是说发展中国家就必须无视自身能力，无条件、一次性地拥抱贸易自由化，但至少应将贸易自由化视为努力方向，而不是负担。当前的WTO优惠待遇，初衷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实践中却可能产生负面效果。

中国的特例

中国虽然在入世谈判中主张了发展中国家身份，但实际优惠非常有限。

而中国在WTO中又是一个特例，中国在WTO中因发展中国家身份，而享受的豁免和例外，比其他发展中国家要少的多。

世贸组织的前身关贸总协定，在乌拉圭回合（Uruguay Round，1986-1992）谈判之前，对于新成员，特别是新的发展中国家成员，加入要求较为宽松。关贸总协定时代（1948-1994），缔约国的前殖民地，在独立之后只需申请就可以加入，理论上不需要做出任何承诺。结果就是早期加入的发展中国家（如尼日利亚），往往保留了较高的关税壁垒。但在乌拉圭回合之后，新成员的加入条件，特别是其贸易自由化的标准，大大提高。

这其中又以中国为甚，2013年中国的平均执行关税是9.9%；而当时同样主张发展中国家身份的巴西，虽然比中国更“富裕”（人均GDP更高），平均关税却高于中国（13.5%）。二者的区别就是，巴西加入世贸比中国更早。中国入世的标准和条件比其他国家要高很多——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入世谈判极为困难，前前后后谈了15年之久。

中国虽然在入世谈判中主张了发展中国家身份，但实际优惠非常有限。虽然获得了一些过渡期安排，但并不是所有的过渡期都对中国有利。例如，中国的入世条件中包含了一个“15年非市场经济地位”的条款。这个条款允许其他世贸成员在15年内不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在反倾销反补贴调查中也就可以因此可以执行更严厉的惩罚性措施。这一过渡期在2016年到期，但是美欧目前没有任何迹象改变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实际上在无限延期。另一个例子是，美国在中国入世之后的很多年里，仍然保留了在某些产品上对中国单方面执行贸易限制的权利。在入世之后的其他新条约谈判中（如《贸易便利化协定》），中国也并没有获得太多发展中国家优惠。

正如前文所说的，宽松的入世条件并不总是有利，严苛的标准有时也可能是“良药苦口”。经济学家邓敏强和魏尚进发表于2008年的一项著名研究显示：加入世贸组织的标准越高，对国内经济改革的推动力越大，之后经济表现也越好。中国是同期加入世贸组织的成员中作出改革承诺最多的，同时中国在入世之后的经济增长也是显著的，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关联联系。表面上是吃了亏，实际上却让反对改革的国内利益集团少了一个阻挠的借口，这也就是朱镕基时代，中国成功以对外开放，倒逼国内改革的关键所在。

美国自然也明白，仅仅摘掉中国在 WTO 中“发展中国家”这顶帽子，对中国的国际贸易地位并不会产生什么实际的影响。但这只是美国推动WTO改革的第一步，其象征意义大于实际影响。对于美国来说，最终的目标是让 WTO 从一个仲裁、磋商机构，变得更有强制力，减少现有规则的弹性和例外。相比美国单边发动贸易战，改革多边国际组织的倡议也更容易获得欧盟和日本的支持。



发达国家在许多国际条约中要承担的义务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例如在应对气候变化的里程碑协议《京都议定书》中，发达国家有强制的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目标，而发展中国家则没有。摄：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为什么中国坚持要做“发展中国家”？

“发展中国家”这个名词的政治意义，也远远大过其实用价值。

既然中国并没有享受到什么优惠，为什么还要努力保留发展中国家这顶帽子？私下里，一些中国官员透露出来的态度是，只要中国能够保留发展中国家这个身份，其他都可以谈——这未免令人好奇。

一种解释是，虽然发展中国家这个身份在WTO已经对中国没有实质意义，但在其他国际组织和条约中仍然重要。发达国家在许多国际条约中要承担的义务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例如在应对气候变化的里程碑协议《京都议定书》中，发达国家有强制的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目标，而发展中国家则没有。其理论根据，便是与WTO十分类似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Common But Differentiated Responsibilities)。减排意味着大量资源投入，是短期内的经济负担。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当前没有任何强制减排的义务，但如果在WTO中“升格”，就很难保证不产生连锁反应，在其他国际条约中面临大量的发达国家义务。

除此之外，“发展中国家”这个名词的政治意义，也远远大过其实用价值。

中国的“发展中国家”身份，最早还要上溯到“第三世界”这个概念。如今人们似乎都已经默认了中国是“第三世界”国家（至少曾经是）。但按照最初“三个世界”的意识形态分类，共产主义阵营的中国应该属于“第二世界”才对。中国是什么时候变成“第三世界”的？

中国自我认定为第三世界，最早发生在70年代。中苏分裂后，中国调整“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开始寻求新的国际定位。1974年，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中国自此正式以“第三世界”国家自居。而毛泽东这个分类法的依据，既不是意识形态，也不是经济水平，而是权力分配：单极世界/两极世界/多极世界。“多极世界”是主宰今日中国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的世界观，而中国所处的这一极，就是发展中国家。而中国论证自身发展模式的合理性，需要证明“中国模式”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使用。正如官方文

宣所说：“中国的成功证明，西方模式不是唯一的选择，西式制度不是唯一的方案，资本主义道路不是人类通往现代化的唯一道路。”

人权常常是中国在国际秩序输出中的弱点。如果说“中国模式”的经济逻辑尚有一定吸引力的话，所谓“中国梦”背后的道德和价值吸引力，仍然几近空白。而“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则为中国提供了一个难得的人权理论支撑。1986年联合国《发展权利宣言》将发展权利定义为“不可剥夺的人权”，这当然不是说发展权是人权的唯一内容，但却很方便地成为了中国人权论述的重要论点。紧紧抓住“发展权”这一项政治权利，将经济绩效上升为道德正义，就成为了一种非常现实的选项。如人民日报以下这段论述：

“发展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联合国《发展权利宣言》确认发展权利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作为一个拥有十三亿多人口的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发展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中国坚持把人权的普遍性原则同本国实际相结合，坚持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的基本人权。”（习近平《致“纪念〈发展权利宣言〉通过三十周年国际研讨会”的贺信》，2016年12月4日）

要证明“中国模式”的适用性，中国必须保持发展中国家的定位。如果中国升级为“发达国家”，那么中国要解决的问题，就从全世界大多数发达国家的问题，变成了全世界少数的发达国家问题，实用性和吸引力大大降低。而且，发达国家的问题大部分是所谓“资本主义问题”——中国要么承认自己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要么被迫对资本主义发起正面挑战。对于当前的中国来说，两者显然都不可行。

而在国际秩序之外，丢掉“发展中国家”这顶帽子，也将牵动许多国内的敏感神经。从宪法到执政党，今天的中国依然理论上是一个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国家。然而中国可以长时间避免“姓资姓社”的争论，允许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生产方式并且允许私有制，靠的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意识形态补丁。按照官方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意味着生产力不发达，而正是因为中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有存在的合理性。而一旦“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定位发生改变，中国变成了一个发达国家，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有存在的必要吗？还应该允许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吗？这就会变成一个棘手的问题。

不要以为这只是一个理论问题。

不要以为这只是一个理论问题。2018年底，民营企业因为信贷紧缩而普遍面临巨大生存压力之时，舆论场里突然跳出一个不知什么来头的吴小平，发表了著名的“私营经济离场”论。其言论之直白，时机之敏感，身份之神秘，一时引发巨大政治猜想，甚至造成不少民营企业家的恐慌。“吴小平”们的核心逻辑是，私有制在中国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只是暂时性的工具，终究有一天要离场，而现在离场的时刻已经到来了。此后，但凡有风吹草动——如马云退休、国企收购民企，总有人要担心这是新一轮“公私合营”的开始。企业家信心动摇直接导致经济不稳，最后习近平需要以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身份来举行一场“民营企业座谈会”，才暂时稳住了信心一旦中国对外宣布已经成为“发达国家”，上述场景恐怕又要再来一次。

中国的发展中国家之辩：不是我在哪里，而是我要去哪里

在可见的未来，中国还都会选择做一个非常特别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有这个世界近六分之一人口和经济活动。这样的规模也就意味着，任何以“平均国家”作为潜在应用对象的国家分类法，面对中国时，都会显得笨拙。“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这样的简单两分法，在技术上很难描述中国的现状。

有人可能觉的，中美这一轮“发展中国家”口水战，是进入了“什么是平等”这个古老的哲学议题，因此很难有什么明确的结论。其实不然，“发展中国家”这个名称定位对于中国来说有相当明确的路径指向，不仅仅是一个对于事实和现状的描述。其作用并不限于回答“我在哪里”，而暗含着意愿和取向，是“我要去哪里”的问题。

中国需要紧紧抓住发展中国家这顶或许并不怎么合适的帽子，是因为这个身份有利于中国对外输出秩序，制定规则，给“中国模式”提供了上升的空间。这个身份也维持了国内“不争论”的状态，让中国在意底牢结和经济规律之间，得以继续保持平衡。以此观之，在可见的未来，中国还都会选择做一个非常特别的“发展中国家”。

(杨路, 自由撰稿人)

中国

评论

杨路

如果你喜歡
就分享給更多人吧



热门头条

1. 早报：中国央视报导香港女子右眼受伤，引用假照片，“新闻”信源无可稽考
2. “你是香港人来买滤毒罐？”台湾防毒面具相关产品销量上升
3. 即时报道：机场集会大混乱 警察被围后拔枪 《环时》记者及疑似内地辅警被示威者踢打...
4. 818集会：民阵称逾170万人参与，警方数字为12万8千人，示威者最后和平散去
5. 纪羽舟：齐上齐落之前，负责任地检讨813机场“事变”
6. 早报：Twitter、Facebook 关停大量来自中国政府、诋毁香港运动的水军帐号
7. 国际媒体如何报道香港街头抗议运动？
8. 港警强力清场致血腥场面：胡椒球枪扫射示威者，港铁内发射催泪弹，女示威者右眼中布...
9. 揭仲：解放军进香港“维稳治乱”的设想和代价
10. 警方3小时记者会：承认有在示威现场乔装成不同人物，有使用过期催泪弹

编辑推荐

1. 信息战的虚与实：当台湾以“国安”之名，下架一个网站之后
2. “扫黑除恶”在扫除什么？法官、扫黑办主任和政法教师这样说
3. 泛突厥主义的尴尬，与土耳其的苍白中亚梦
4. 土耳其特色的经济危机：虔诚与民粹，成功与失败
5. 信息战的虚与实：沈伯洋不期而遇的战场
6. 寇延丁在宜兰：以农耕疗愈生命，但必须面对的是恐惧
7. 信息战的虚与实：我们和买粉专的“阿峰”聊了聊
8. 何为国，何为民？反修例运动外，大陆网民的政治参与

9. 揽炒、新冷战与颜色革命：历史十字路口的香港与北京

10. 818集会：民阵称逾170万人参与，警方数字为12万8千人，示威者最后和平散去

延伸阅读

WTO谈判重要进展：将全面取消农产品补贴

叶健民：邪恶帝国、天朝大国以外的中国想像

其实我们还可以理解中国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而把国内的种种现象放在这个脉络上，这就可能会有另一种想像。

解密刘鹤——中国新经济计划的顶层设计师

中国媒体称他为“中国新经济计划的总设计师”，美媒则称他为“中国的萨默斯”。这人是刘鹤，习近平曾说：“他对我非常重要。”

徐子轩：贸易烟硝四起，美国和印度也要开战了吗？

华府从印度身上看见了中国的影子，利用美国领导的自由秩序而壮大自己的实力，这就让美国在某种程度上对印度有所防范，如奥巴马政府时期屡屡将印度告上WTO，压制印度的重商主义倾向。

杨路：“伟大的责任来自伟大的力量”——中国的老二困境

随着中国实力的上升，在国际秩序中也必须承担更多的责任，否则必然遭到“搭美国便车”的指责。然而，中国世界愿景的高度，首先基于国内的改革进度。当国内改革滞后，中国这个“老二”即便想承担更多的领导力，也将非常困难。

孔浩烽：TPP的中美竞争和全球贸易新格局

奥巴马政府故意将中国排拒在TPP谈判之外，乃是迫使中国改善美资投资环境的一个手段。

经济学家霍尔兹：贸易战根源是产业竞争，特朗普的“关税牌”完全打错重点

在霍尔兹看来，特朗普发起的关税战是一场“经济学原始人”主演的荒谬真人秀，对于解决实际问题于事无补。而中国，将无可避免地改变世界秩序。